



欧洲现代史

1914 — 1980 年

[美] H. 斯图尔特·休斯 著

商务印书馆



欧洲现代史

(1914—1980年)

[美] H. 斯图尔特·休斯 著

陈少衡 程洪逵 顾以俶 译
姜海 季庄 徐汎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H. Stuart Hughes
CONTEMPORARY EUROPE: A HISTORY
fifth edition 1981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U. S. A.

根据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ŌU ZHŌU XIÀN DÀI SHĪ
欧洲现代史
(1914—1980年)

[美] H. 斯图尔特·休斯 著
陈少衡 程洪逵 顾以倣 译
姜海 季庄 徐汎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38

1984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38千
印数 7,300册	印张 24 5/8 插页2

60克纸本 定价: 3.40元

出版说明

《欧洲现代史》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休斯写作的一部在西方学术界颇受重视的著作。作者亨利·斯图尔特·休斯(1916—)生于纽约市,1940年获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美国国务院欧洲调查室负责人(1946—48年),1957年后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意识与社会》(1958年)、《被堵塞的道路》(1968年)、《大转变》(1975年)及《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历史》等。《欧洲现代史》一书自1961年问世以来,曾多次再版,三次增订。作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作为欧洲现代史的开端;到1981年本书出版第五版时,则把写作的下限扩大到1980年。因此本书可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欧洲现代史著作。

欧洲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欧洲史的写作和研究历来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但大都偏重于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不多,本书是其中写得较有特色的一部。在本书中,作者对于欧洲自1914年以来六十多年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如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以及1929—3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都用整章的篇幅作了深入的论述;另一方面,对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展,书中也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和过去的欧洲史著作不同,休斯的这部欧洲现代史不单纯是一部政治史,它对本世纪欧洲各个时期的思想、文化,诸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有扼要的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实是，欧洲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为东欧和西欧两个部分。然而，作者始终是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分析的。作者认为“欧洲这个名称和古希腊一样，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强调欧洲人把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北方日耳曼文化这种“双重文化传统看作是力量和生命力的源泉”，因此作者极力推崇西欧的作用。至于苏联和斯拉夫世界在历史上的作用，作者则认为是“由来已久的争论”。但是，他也不得不用了相当篇幅来介绍苏联和东欧的各方面情况。

作者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书中时时流露出他的阶级偏见。例如，他虽然承认十月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处境，但又诋毁苏维埃制度和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认为“欧洲最古老的意识形态”（指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在最近十余年间“已经显示出生命力复苏的迹象”。他还污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凡此种种，统希读者在阅读时予以分析和批判。

参加本书的译者是：陈少衡同志翻译了第一至第五章，第十六章；程洪遼同志翻译了第六、七章，第十七至第二十章；姜海同志翻译了第八至第十二章；季庄同志翻译了第十三章；顾以俶同志翻译了第十四、十五章；徐汛同志翻译了第二十一、二十二章。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1914 年的欧洲	3
I. 欧洲独一无二的优越性 II. 新时代的希望 III. 进步意识形态种种 IV. 议会民主制的胜利 V. 危险的信号 VI. 世界冲突的起因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49
I. 冲突的性质 II. 从马恩河到凡尔登的西线 III. 冲突的扩大 IV. 战时经济 V. 旧欧洲的完结 VI. 决定性的一年	
第三章 俄国革命及其后果	103
I. 意识形态和战争 II. 革命前的俄国 III. 从三月革命到十一月革命 IV. 内战 V. 在国际上的失败	
第四章 1919—1923 年的解决方案	139
I. 威尔逊的幻想 II. 中东欧各国的解放 III. 1919 年的和平会议 IV. 巴黎和约 V. 战争终于结束	
第五章 技术与社会：新旧之间	168
I. 新技术 II. 战争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III. 新社会	
第六章 稳定的年代，1924—1929 年	189
I. 洛迦诺精神 II. 保守派政府 III. 潜伏着的复仇女神	
第七章 二十年代的文化	221
I. 文化背景 II. 自然科学的进步 III. 社会科学和哲学 IV. 文学：象征主义遗产 V. 艺术：现代派的胜利	
第八章 大萧条，1929—1935 年	257
I. 根源与特征 II. 中欧：混乱的年代 III. 西欧：飘浮不定	

的年代	IV. 斯堪的纳维亚: 中间道路	V. 议会民主的危机	
第九章 法西斯主义政权			281
I. 墨索里尼的成就	II. 希特勒上台	III. 教权主义—组合	
IV. 法西斯制度的性质	V. 人民阵线思想		
第十章 斯大林主义的制度			319
I. 斯大林权力的巩固	II. 大转变	III. 政治的和社会的	
含义			
第十一章 处于危机中的欧洲文明			340
I. 萧条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后果	II. “战斗”的文学		
III. 宗教复兴	IV. 人民与艺术		
第十二章 走向灾难的道路, 1935—1939年			364
I. 重整军备和莱茵兰	II. 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III. 西班牙	
内战	IV.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V. 最后的一年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398
I. 幻想与闪电战	II. “最光辉的时刻”	III. 胜负未定的	
战争	IV. 形势大转变	V. 最后的攻击	
第十四章 东欧: 革命的年代, 1945—1949年			470
I. 战争结局	II. 先决条件	III. 两种革命	IV. 镇压反
对派			
第十五章 西欧: 恢复的年代, 1945—1949年			493
I. 解放的时刻	II. 经济问题	III. 占领德国	IV. 法国
和意大利: “三党政治”的阶段	V. 英国工党政府	VI. 议	
会制的恢复			
第十六章 文化的重建, 1945—1965年			525
I. 抵抗运动的遗产	II. 文艺界新人才	III. 教育的改革	
IV. 教会和社会			
第十七章 冷战, 1947—1953年			552
I. 东西方分裂	II. 大西洋联盟和由中间派组成的政府		
III. 朝鲜战争与各国的右派政府	IV. 东欧: 恐怖的高潮		
第十八章 殖民帝国的丧失			576
I. 背景	II. 南亚的解放	III. 非洲的觉醒	IV. 对欧洲

的影响	
第十九章 欧洲人自己当家作主, 1953—1960年	597
I. 国际风云的变幻 II. 西方的保守主义民主政府 III.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独裁政权 IV. 斯大林死后的东欧	
第二十章 新社会, 1960—1968年	632
I. 欧洲的人口 II. 东欧: 新中产阶级 III. 西欧: 民族争端	
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减少	
第二十一章 沉闷的七十年代	672
I. 东欧: 布拉格事件以后的时期 II. 西欧: 变化莫测的时代	
III. 南欧: 民主国家的边缘 IV. 共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危机	
第二十二章 欧洲的反省	715
I. 意识形态的复兴和新文化特征 II. 知识分子的苦恼	
III. 社会的紧张气氛	
索引	732

地 图

1. 1914年的欧洲	4—5
2. 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线	60
3.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东线	70
4. 1923年的欧洲	158
5. 1941年希特勒的欧洲	387
6.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东线	420
7. 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线	451
8. 1980年的欧洲	730—731

前 言

这本书在体系和构思方面完全是我个人的见解。我是根据这样的信念来写成这本书的：欧洲历史以往的六十年，需要有一部不那么详尽但却比较观点鲜明的论述，而不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的一般著述所特有的那种处理方法。因此，我在发表见解和做出判断时毫不犹豫；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读者不同意的话，那么，至少他知道他不同意的是什么。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在每章结尾的阅读材料方面，只罗列了一些比较值得一读的和比较新的阐释性材料，在第十六、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章，我略去了阅读材料，因为在这些章里，书刊和期刊的引文对一般读者来说过于零散和过于专门化了。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的各关键阶段上，有几个人给了我帮助并提出建议。我特别感激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理查德·派普斯和斯蒂芬·A·舒克。我的两个大孩子（从一开始，这本书就是题献给他们的）怀着兴趣和热情密切注意了这项工作，而我的最小的孩子（我在十年以前那一版的题献上把他的名字和两个大孩子的名字列在一起了）则对欧洲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好奇心。

在相继的三次修订的过程中，我的妻子朱迪，既曾非常细心地查出了事实的错误，又曾经常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

第一章 1914年的欧洲

1

I. 欧洲独一无二的优越性

二十世纪初，人们仍然认为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还有大多数非欧洲人，都认为这个小小的大陆，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就象前四个世纪那样。很少有人觉察到欧洲的世界霸权的末日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头。过去半个世纪的情况标志着欧洲时代的结束。但是，如果把过去五十年的欧洲历史只归结为一种与人力无关的衰亡的客观记录，就会忽视人类经验中极其丰富而复杂的那一部分：即欧洲历史的内部情况。在1914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欧洲人只是偶尔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历史命运。他们继续作为欧洲人而生活，全神贯注于民族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贯注于维持和扩大他们的文化遗产。

考虑到后来演变成世界大战的两次欧洲战争的前因后果，再加上长期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使欧洲人集中注意一些他们认为属于本洲所特有的问题：民族间的对抗，经济上得不到满足的人们的斗争以及要求公民绝对服从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其中有些已变得不那么尖锐；另一些则在本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人开始寻求新的平衡而逐渐过2
过时。就在这时却出现了最异常的现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正在达到新的平衡、树立新的自尊心。他们当年称霸世界的雄心已成过去，现在正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事务上，这不但得到过去的崇尚的认可，而且也得到今天的需要的支持。欧洲人目前正扮演另一个较为谦逊的角色，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作为急起直追他们

3

的其他人类的有经验的带步人和应有的榜样。

欧洲的文化遗产

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深感那培育自己的欧洲文化社会地理范围狭窄和它对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极不相称，因而叹息说，“这只不过是亚洲大陆上一个小小的海角啊！”连瓦莱里这样的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欧洲如此卓越呢？在全部世界史上众多的种族中间，为什么只有欧洲人成功地在全世界取得优势地位？

最明显的答案就是欧洲的工业技术优越。在全世界所有的伟大文明当中，只有现代欧洲在技术变革中创造出持久的动力：中国人——甚至古代罗马人——对他们祖先的技术成就稍事改进即已满足，但现代欧洲人却根据科学方法一代接一代加速改进、突飞猛进地发展科学技术。欧洲人在一心钻研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发展了一种新式工商企业。和现代技术一样，现代资本主义具有一整套极复杂的金融和工业机构，这是欧洲精神独一无二的创造。

欧洲人并不满足于仅仅依靠实力和财富坐享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他们在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力量和自信的主要源泉。当欧洲人把自己的知识和艺术、哲学和宗教，同其他文明相比较时，使他们感触最深的，首先是变化万千的欧洲河山以及明镜一般反映欧洲秀丽风光的文化，正象这个大陆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变幻无穷的美景那样呈现生动的对照。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和印度以及后来的南北美洲的地理和文化千篇一律，而小小的欧洲大陆的地理和文化与之截然不同，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却集中了连绵不断的伟大成就和无尽希望。

理解这个丰富多采的文明的线索就是追溯现代欧洲起源的本身。中世纪初期即已成形的欧洲文明，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源泉：

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也曾先后在欧洲称雄。但是，每个国家的超群出众的地位都有对手争夺，因而从未牢牢确立。建立一个和遍及世界的教会相平行的一统天下的帝国是中世纪的理想。自从这个理想崩溃以后，各个地区的独立自主就成了欧洲的传统。欧洲这个名称和古希腊一样，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没有任何政治组织使欧洲形成共同的精神和社会形式。

在这一点上，欧洲人再次在他们的缺点里恰巧看到优点。他们争辩说，古希腊正是由于政治上不统一，才保持了文化上的生命力，而且这个文化还能够影响并同化异己的社会；这个伟大的文化正是从自己诸支派的互相对比和竞争中汲取力量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尽可经常打仗，但他们在一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双方都认为全体希腊人都是优越的。在现代欧洲，两大文化传统的领导者4 法国人和德国人，虽然经常厮杀搏斗，但都因为双方共享的法律和教育、宗教和经济实践等遗产而感到骄傲。乐观的欧洲人认为，民族竞争是健康的、“赋与生命力”的东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族竞争的危险，因而对这种冲突可能带来的灾难未能采取预防措施。

欧洲这个不统一的传统最后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里得到表现。若干世代以来，欧洲人（还有美国人）把民族国家看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认为正常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是：在一片相当大的领土上居住着自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同类的人民，并要求全体居民对本国忠诚不二。这个政治模式目前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掩盖了它的起源只是比较新近的事情这一事实。并且也使大量的各种各样其他可能的政治模式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被排除了。

民族国家是欧洲的发明创造。虽然本世纪世界各地都在仿效——其结果常常希奇古怪——但它的起源却是在西欧，时间是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之间。首先是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把自己

的公民组织在共同核心周围。在十九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克服了它们更加顽固的分裂，并作为民族国家出现。到二十世纪，民族国家已成为整个西欧的准则。在中欧和东欧，多民族的奥地利和俄罗斯两个帝国，作为旧时代的残迹遗留下来。但这些帝国也是君主国，不允许臣民忠诚于任何更高的东西。

这种忠诚不二的思想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政治上一项伟大的新事物。从前，经常有一些比较狭窄的效忠义务如忠于市政当局，忠于行会、封建领主等等来争夺并分散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有比国家更广大的效忠义务如忠于神圣罗马帝国、忠于普世教会、忠于贵族之间的国际团结等等分散个人的政治献身精神。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比较古老的政治效忠对象不是消失就是衰退了。在欧洲全部历史上，只有从1866年德意志联邦解散到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之间的这些年里，才是一点国际政治组织的痕迹都没有的。到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民族国家便要求专一的绝对忠诚。

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危险，因为忠于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排他性的情绪，不但加深了旧恨，而且激起了新仇。特别是把民族说成是使用同样语言的人们组成的这种倾向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就把极其复杂的问题极端简单化了，并鼓励了一些互相冲突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是不可能调和的。实际上，民族感情只是部分地起源于语言。例如，使用三种语言的瑞士就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传统和历史也使居住在某个地理区域的几百万的人们感到同属一个民族，这和语言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宗教也能激起民族感情——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设法把使用英语但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保持在自己国内时遇到的那些困难就是证明。

十九世纪欧洲人倾向于把一种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作为民族的标准，从而把语言和种族等同起来。实际上，用来区分人类的这

两个标准,几乎是毫不相干的。种族是生物学上的事情,而语言则是历史和人类经验的文化产物。小孩子必须学习他应学的语言;但如果把他弄到别的地方,不管他原属哪个“种族”,也会同样容易地学会另一种语言。要划分清楚欧洲的种族界线简直是不可能的,大陆上的种族界线和语言界线很少相符。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是“白种人”,但如何把这群人再细分成较小族类或“世系”,人类学家就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了。可以明显看出,许多瑞典人都是白肤金发碧眼的,大多数西班牙人都是黝黑的;但是,除了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以外,人们也说不出其他什么确切的东西。当然,欧洲各主要民族看起来都是令人迷惑难以解开的各种血统的混合体。事实上,一般德国人和一般法国人的体形是很难区分的。

然而,在1914年,普通的欧洲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现代人类学的新发现。他们听到的关于种族方面的知识几乎完全是错误的,不过这点东西就足以毒化气氛的了。自以为和别人属于不同种族的想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天赋民族品质的思想,而这些民族特殊品质又必然变成民族天生的优越性的标志。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里,使欧洲文化统一体内部虽说脆弱但还可以看得见的那些联系遭到破坏的,莫过于关于民族和种族差异的这些广为流传的一套套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所谓“理论”了。

危险在前面

到二十世纪初,欧洲文明——经过一千年的培育才成长起来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无限宝贵的文明——的整个概念,已经处在危险的绝境中。超国家的或乡土性的忠诚消失了,民族仇恨却不断加强,然而,意识到这类事情当中的危险的人,在欧洲却少得出奇。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危险,在二十世纪初,象大片乌云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

欧洲本土这块基地显得相当狭窄，这一点正日益突出。在正在到来的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大规模活动的时代里，欧洲必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它的幅员太小、本国市场太狭隘、传统的做法太费力了。过去的优点变成今天的弱点。欧洲过去是以细致的、手工艺的方式发展技术的。在今天大规模生产的世界里，有利条件存在于新兴国家美国和日本，还存在于俄国和中国有待开发的潜力。在这些辽阔地区，从古老的传统结构中残酷地驱赶出来的流动人口，能够很快学会欧洲技术，赶上他们的老师，然后就用这些技术打击它们的发明者。

到了1914年，世界对欧洲经济和文化的颂扬将不会继续多久了，这一点本来应当已经是了如指掌的了。但是，大多数欧洲人只是偶尔注视一下标志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两次短暂而惊人的战争而已——在1898年那次美西战争中，美国剥夺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最后残存的属地从而作为世界强国出现；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帝俄被新兴起的日本打得惨败。

欧洲少数外交家对这些事件的意义有认识，但大多数人未免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欧洲内部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上去了。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外交家的活动一直受“欧洲协调”这个虽很微妙却很真实的概念的支配，所谓“欧洲协调”指的是欧洲的总的利益，需要由各大国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加以维护。到了1914年，“欧洲协调”这个概念几乎就已死亡了。1878年各国外长为了作出有关欧洲全局的决议而在德国首都柏林聚会就是这类会议的最后一次。

为国际事务出力的出身高贵的人业已过时，这情况仅仅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变化当中的一部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外交几乎全部都是由贵族阶层的成员进行的——这个社会等级只作了部分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民族国家这个现代概念。欧洲贵族